

## 国家图书馆藏隋开皇二十年写本《仁王经》

□ 于瑞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《仁王经》又名《仁王般若经》《仁王般若波罗蜜经》《仁王护国般若罗蜜经》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等，印度大乘佛教经典。此经历史上共有四个译本：西晋竺法护译本，名《仁王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一卷；后秦鸠摩罗什译本，名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二卷；梁真谛译本，名《仁王般若经》，一卷并疏六卷；唐不空奉诏重译，名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二卷。现传世译本仅有鸠摩罗什和不空所译的两种，两种译本均为历代大藏经所收。

此经虽属般若系经典，但主要宣传般若有守护国家之功。仁王，指古印度十六大国的国王，相传佛为使诸国稳定，向诸王讲说此经，使各护其国，受持此经则国土安稳、七难不起、灾害不生、万民丰乐，具护国佑民之义。因此，该经与《妙法莲华经》《金光明经》一起被视作镇卫国家、繁荣社会的“护国三经”之一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，广为流传，并在各地敕建以“护国仁王”为名之寺庙。史籍中记载此经的流传大致始于南北朝时期，但自流传之初至南朝梁武帝时期，《仁王经》一直被视作“疑经”，影响有限。至梁末陈初时，此经流传大盛，备受重视。隋代，隋释吉藏撰《仁王般若经疏》三卷、隋释智顓（口述，门人灌顶记）撰《仁王护国般若经疏》五卷，可见《仁王经》的流传依然盛行。

敦煌遗书中保存有此经的写本文献总数近80件<sup>①</sup>，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共藏有十件《仁王经》的写卷，编号分别为BD01344、BD05876、BD06561、BD09525、BD09526、BD09919、BD10336、BD12004、BD12357、BD14483。在这些写本中，BD14483保存有索显哲的题记愿文，对研究当时信仰形态、功德形态、宗教思想以及对此经的崇拜均有较大价值，殊为珍贵。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隋开皇二十年(600)敦煌写本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下》(BD14483)，残卷的抄写内容包括卷下受持品第七的后半段以及嘱累品第八。此件首残尾全，高25.6厘米，长52.6厘米，7纸，存183行，行17字，隶书，首纸背墨书“隋开皇”。卷轴装，乌丝栏，尾有原木轴，两端涂黑漆，顶端点朱漆。写卷首五行中下部残缺，第五纸卷中题“般若波罗蜜嘱累品第八”，尾题“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下”。尾题后另有写经题记8行，兹逐录如次：

大隋开皇廿年二月十五日，佛弟子索显哲发愿，息洪相造《仁王经》一部并及庄严悉讫。又愿洪相见存父母，六府康和，众魔隐塞，世世常近父母边，供养供给。恒愿诸天诸佛，拥护易接，历劫不堕三途八难，子孙衣食丰饶，奴婢成行。逮及见[在]眷属并得平安，共一切众生，相将成佛。经生茹长慈。

<sup>①</sup>刘毅超：《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》，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360—361、710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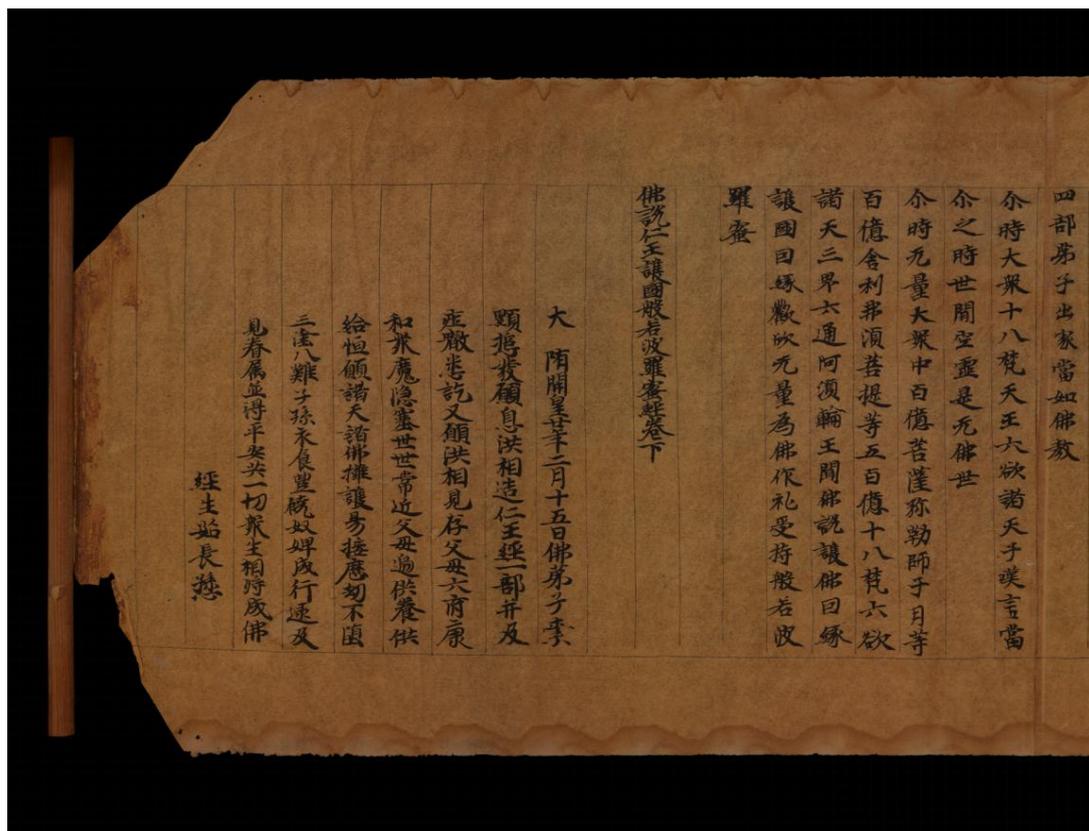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BD14483《仁王经》尾题及写经题记

根据题记可知，此件写卷为敦煌索氏家族向寺院施舍的经卷，出自专门抄写经卷的经生茹长慈之手，抄经时间为隋开皇二十年。发愿者索显哲，生平史籍未载。索氏是汉代徙居敦煌的汉姓，据 P.2625《敦煌名族志残卷》索氏条记载“汉武帝时，太中大夫索抚、丞相赵周直谏忤旨，徙边，以元鼎六年（前 111）从钜鹿南和迁于敦煌。”其子孙后代定居于此，遂为敦煌人。索氏被贬迁入敦煌后，活跃在敦煌纷繁的历史舞台上，逐渐发展壮大，成为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郡望，影响着敦煌社会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，被称为“龙沙鼎族”。敦煌遗书 P.4010+P.4615《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》中提及索崇恩高皇祖索哲：“高皇祖哲，随（隋）朝朝散大夫、[大]黄府校尉、守龙勒府长……”<sup>①</sup>，据郑炳林先生考释索哲其人时称，史籍均不载其事迹。大黄府为隋唐时期敦煌郡置，P.2117《大般涅槃经卷第卅三》尾题有“大业四年（608）四月十五日敦煌郡大黄府旅帅王海，奉为亡妣敬造涅槃法华方广各一部……”。又 P.2551《圣历元年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并序》载：“祖操，隋大黄府上大都督车骑将军”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四》陇右道瓜州晋昌郡条：“武德五年（622）析沙州之常乐置。……有府一，曰大黄”<sup>②</sup>，是唐承其旧。龙勒府，隋唐军府名，《元和郡县图志·陇右道下》沙州寿昌县条载：“隋大业十一年（615），于城

<sup>①</sup>郑炳林、郑怡楠：《敦煌碑铭赞辑释》（中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720页。

<sup>②</sup>[宋]欧阳修、宋祁等撰，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：《新唐书》卷四十志第三十地理四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1045页。

内置龙勒府”<sup>①</sup>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四》陇右道沙州敦煌郡条载“有府三，曰龙勒、效谷、悬泉”<sup>②</sup>，是亦承隋之旧。

我们注意到，《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》记载的索崇恩高皇祖索哲为隋朝散大夫、大黄府校尉、龙勒府长。与索显哲相比，笔者颇疑索哲即索显哲，两者当为同一人。原因有以下几点：其一，两人姓氏相同，名字中都有一个“哲”字，籍贯均在敦煌地区，主要活动时代皆在隋代。其二，隋代，索氏家族名人见载不多，且作为敦煌郡望索氏家族应该更加重视家讳，家讳一般要避免使用君父尊亲的名字，故索氏家族在享国日浅的隋代同时出现“索哲”与“索显哲”二人名并存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其三，中古时期人名经常出现文字减省的现象，名字中省略或增加一字颇为常见，这种情况在敦煌写卷中屡见不鲜，而非衍字或脱字。如敦煌写卷中元魏瓜州刺史“元太荣”又写作“元荣”、唐前期军将“张令端”又作“张端”、晚唐敦煌寺学名师“张景球”又作“张球”、五代西汉金山国主张承奉又作“张奉”等等，皆是如此。陈国灿认为这种省称“是唐时瓜、沙、伊、西一带称呼上的一种习惯”<sup>③</sup>。因此，“索显哲”也可以被省写作“索哲”。其四，从敦煌遗书中的发愿题记来看，发愿者一般通过自己撰写、请人书写等方式完成抄经。一般来说，达官贵戚雇佣经生抄经必然要请书法娴熟的经生，待遇亦十分优厚。细审此卷，发愿者索显哲出资延请的经生茹长慈已达到较高的熟练度，能够严格按照格式抄写，字间距大致相等，行内字数固定，书写工整、笔画清晰，布局规整、严肃，能最好地表达信众的虔诚发愿。据此推断索显哲应当具有一定的身份与地位，或具有一定的官职，这么看来隋朝散大夫、大黄府校尉、龙勒府长与索显哲此人身体的匹配度甚高。基于以上论证，基本可以判定索显哲即索哲。

再看题记内容“佛弟子索显哲发愿，息洪相造《仁王经》一部并及庄严悉讫。”息，子也，可知洪相应为索显哲之子，洪相在之前造《仁王经》一部施舍寺院，用于佛前供养或秘藏在佛塔、石龕和石窟等处，其后索显哲又请经生茹长慈抄写该经以作发愿，愿文为“又愿洪相见存父母，六府康和，众魔隐塞，世世常近父母边，供养供给。恒愿诸天诸佛，拥护易接，历劫不堕三途八难，子孙衣食丰饶，奴婢成行。逮及见[在]眷属并得平安，共一切众生，相将成佛。”根据发愿内容，大致可分为两层含义，一层是希望其子洪相平安康和，能常在父母身边孝顺供养，惠及现世父母；另一层是希望其索氏家族不经三途，不经八难，子孙兴旺富足、奴婢成行，祈福平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仁王经》本身具有多种功德利益，主要包括护国佑民、禳灾、得福康乐等方面，这与当时的仁王信仰希冀护持国家、禳灾祈福的思想息息相关。该则题记的发愿内容较为注重为家人造经功德，偏重于与自身相关的祈愿，护国思想体现的并不十分明显，区别于以往此经被用于护国重典的意义，而在强调佑民，笔者推测这与《仁王经》注重现世利益的信仰思想有关，为惠及现世而祈祷，符合一般民众的现世追求。

此件原为刘廷琛旧藏，刘廷琛（1867—1932）字幼云，号潜楼，江西九江人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进士。晚清学部大臣，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。1910年，刘廷琛在劫余敦煌遗书解运

<sup>①</sup>[唐]李吉甫撰，贺次君点校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第四十陇右道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1026页。

<sup>②</sup>《新唐书》卷四十志第三十地理四，第1045页。

<sup>③</sup>陈国灿：《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——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》，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编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（文史·遗书编）》上册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21页。

北京学部后，伙同李盛铎等学部大臣监守自盗，择其尤精者，攘为己有。刘廷琛故去后，其收藏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归其亲戚张子厚所得，后又被在华北伪政府任职的吴瓿购得。1952年，吴氏所藏刘氏旧藏敦煌遗书作为逆产收归国有，1954年2月11日文化部将此批敦煌遗书拨交国家图书馆。此件外包装为黄色绸绢，黄绢缝有白布题签，签上楷体书写文献抄写的朝代、题名、长高尺寸和编目序号，即：“隋开皇二十年茹长慈写仁王经 长九尺 高七寸三分 015”。黄绢丝带上系一标签，上书“接 3941”。《董康东游日记》曾著录此卷<sup>①</sup>。

---

<sup>①</sup>萨仁高娃：《董康东游日记所涉敦煌遗书之归属与流传脉络》，收入《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（下册）》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，第465—478页。